

国有企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机制创新的实践探索

甘鑫强

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关键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的发展优势、治理优势和实践胜势。本文结合重庆高速集团党员“一带N”先锋工程的实践探索,就国有企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机制创新谈几点思考。

一、深刻把握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机制创新的理论逻辑

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要求,既取决于党员个体的党性修养和能力素质,更依赖于制度机制的设计与保障。当前,国有企业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传帮带作用)发挥仍面临一些共性问题:责任不明导致“带什么”不清晰,激励手段单一导致“愿意带”动力不足,技术赋能不够导致“善于带”方法欠缺。推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机制创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深化国企党建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国有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课题。

二、党员“一带N”先锋工程的实践探索

重庆高速集团以市国资系统党建工作改革创新“揭榜挂帅”行动为契机,立项实施党员“一带N”先锋工程。该工程以“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主题,按照“一支部一特色”要求,采取“一对一”“一带多”“项目式”等帮带方式,构建起党员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制度化网络。一是聚焦“带什么”,构建“五带”内容体系。围绕中心工作,明确“带思想、带业绩、带技能、带安全、带作风”五大“帮带”维度。“带思想”突出政治引领,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带业绩”聚焦国企改革攻坚、急难险重任务,引导党员在重大任务中当先锋、作表率;“带技能”着眼能力提升,用好生产现场、工作一线等场景开展现场教学和实操培训;“带安全”落实“一岗双责”,切实做到“四不伤害”,筑牢安全底线;“带作风”推动清廉国企建设向基层延伸,

引导职工做到清正廉洁。二是聚焦“怎么带”,创新帮带运行机制。建立“八步工作法”结对帮带机制,推行业绩指标“双进入”、承诺践诺“双公开”、述职述责“双报告”、考核结果“双运用”和实绩晒单“双争先”的“五双”工作机制,形成“带有方向、带有标准、带有考核”的闭环管理体系,依托红岩先锋党员突击队、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和党员服务队等平台载体,鼓励党员在重大工程、市场开拓、科技创新等领域“揭榜挂帅”“实绩晒单”,实现帮带从“软要求”向“硬约束”转变。三是聚焦“带得好”,健全激励保障措施。把党员考核与岗位晋升、绩效奖金充分挂钩,实现物质奖励与职业发展联动,调动基层骨干党员参与创新的积极性。落实思想动态研判机制,关心解决职工合理诉求和实际困难,把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的要求具体化,激发党员持续发挥作用的内生动力。

三、实践成效与经验启示

实践表明,推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机制创新,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点:一是要坚持系统思维,把党员作用发挥纳入党建工作整体格局来谋划,实现从“个体先进”到“整体带动”的跃升。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紧扣企业发展中心任务设计“帮带”内容。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能脱离生产经营“自转”,必须围绕中心工作“公转”,在推动发展中彰显先进性。三是要坚持闭环管理,建立可量化、可考核、可追溯的评价体系。通过“五双”工作机制,让帮带工作有标准、有检查、有反馈、有改进,防止“重形式、轻实效”,确保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四是要坚持技术赋能,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帮带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实现对基层职工的常态、动态、精准培养,促进基层员工整体素质、技能水平稳步提升。

作者单位: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延安精神视域下科技创新助推新质生产力路径研究

章竹喧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高质量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其核心驱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战略节点,面对大国博弈的深化与国际技术壁垒的加剧,如何从党的红色精神谱系中汲取战略智慧,成为破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代课题。延安精神蕴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优良传统,与新时代“科技自立自强”在保障国家发展主权、发扬自主创新精神上具有高度的血脉延续性与内在契合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延安精神作为先进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能够有效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文旨在为新质生产力的路径研究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关键词:延安精神;自力更生;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

一、从“自力更生”到“科技自立自强”的演进脉络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高超的战略智慧调整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抓手。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面临极其严酷的外部军事封锁与经济禁运。面对“几无衣穿、几无油吃”的极端困境,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依附他人绝无革命胜利的可能,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根本方针。这一时期的自力更生绝非封闭保守的盲目摸索,而是蕴含着强烈的科学求实精神与科技探索实践。党在延安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等专门学术机构,积极动员并吸纳了一批海外归国及国统区知识分子。科研人员扎根边区本土资源,开展了军工制造、医药提炼、肥皂与造纸改良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打破了敌对势力的物资封锁。这种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生存与发展难题的伟大实践,不仅奠定了大生产运动的物质基础,也让科技服务于人民、服务于革命事业的红色基因在延安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步入“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拓展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烈震荡,科技创新已然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大国战略博弈的绝对焦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章中强调,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以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这实际上确立了创新的核心地位。此时的科技自立自强,不再仅仅是危机状态下的防御性生存手段,而是大国走向科技强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

从历史上的“自力更生”到现实中的“科技自立自强”,其本质是一脉相承、辩证统一的。延安时期的自力更生重在解决“有没有”和“活下来”的生存红线,新时代的科技自立自强则

侧重于解决“强不强”和“自主控”的发展主权。尽管时代背景、科技形态以及所面对的生产力质态发生了跃迁,但其核心追求都是坚持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将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历史的跃迁与现实的呼应,构成了两脉相通、薪火相传的演进脉络。

二、延安精神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唯物史观的科学视角来看,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先进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先进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延安精神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并非概念的简单嫁接,而是通过作用于创新主体(劳动者)、改变创新工具(劳动资料)来重构生产力质态,两者具备深刻的政治逻辑、实践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理论耦合。

在政治逻辑上,党的绝对领导是激发创新动能的根本保障。延安时期,党中央通过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动员,把不同背景的科技人才和极其有限的资金物资高效统筹起来,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合力。新质生产力以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为主要标志,这类技术往往研发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系统协调性强,必须依赖强有力的宏观统筹。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组织支撑。通过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现代科研院所、高校及科技领军企业的治理效能,能够有效打破部门壁垒和学科界限,保障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定向精准发力,从而在现代科技战争中实现战略协同。

在实践逻辑上,实事求是破解生产力“卡脖子”问题的根本方法,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生产一线,完全依据边区资源现状开展技术革新,绝不搞形式主义。当前,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基础研究积累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较弱的突出堵点。部分前沿领域的创新仍存在跟风、追热点现象,甚至出现虚假科研。发扬延安精神,要求我们在科技创新中必须彻底践行实事求是的作风。科技创新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纸面创新,必须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痛点,脚踏实地地攻克基础算法、核心材料、精密元器件等底层难题,根据不同区域的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布局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在价值逻辑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归宿。延安精神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陕甘宁边区所有的科技尝试与生产力发展,其落脚点皆在于改善军民生活、争取抗战胜利。新质生产力虽然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绝非冷冰冰的资本增殖工具,而是符合新发展理念、造福全社会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直接界定了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属性。无论是发展新型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还是加速生物医药技术的研发,其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当前新质生产力培育中面临的创新挑战

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已大幅跃升,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持续前移,然而立足于更高战略要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仍存在若干突出的现实掣肘。

首要问题在于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亟待提升。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呈现出明显的“应用强、基础弱”的结构性特征。在技术应用、模式创新和产业链中下游领域我们具备较强优势,但在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和基础科学理论的源头供给上依然存在短板。由于基础研究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和漫长的回报周期,现行的科研评价机制和利益驱动往往导向短期见效的应用研究,这导致新质生产力缺乏源源不断的底层动力支撑。

其次是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存在受制于人的隐忧。在高端芯片、基础工业软件、关键控制系统以及核心原材料等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上,对外依存度依然偏高。这种技术层面的脆弱性,使得我国的产业链在面对外部“断供”或极限施压等风险时,极易面临被卡脖子的被动局面。这不仅威胁国家安全,也限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提升。

最后是创新生态与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仍需深化改革。目前,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深度融合尚未完全形成良性循环。部分高校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产业的战略需求存在脱节,缺乏复合型、战略型的领军人才。同时,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在部分地区依然不够畅通,赋予科学家更大科研自主权的政策在基层落实中仍存在条块分割和制度惯性。

四、延安精神引领高水平科技创新助推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针对上述面临的现实挑战,在新时代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刻激活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将红色精神财富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抓手、政策举措与实践笃行。

第一,要以思想铸魂凝聚科研合力,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延安时期火热的政

治热情与奉献精神融入现代国家实验室和科研团队的建设之中。在科研一线强化政治引领,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将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国家复兴伟业,把论文真正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同时,要坚决摒弃急功近利、浮躁虚假的科研作风,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甘坐十年冷板凳的基础研究文化,为科研人员卸下思想包袱。

第二,要以艰苦奋斗精神攻坚核心技术,健全与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面对外部技术封锁,必须重温延安时期打破封锁的拼搏劲头,把国家安全与生存发展牢牢建立在自主可控的坚实基础上。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以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为核心纽带,组建多学科、跨领域的创新联合体。在重大科研项目组织形式上,推行揭榜挂帅和赛马机制,聚焦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集中优势兵力打破关键核心材料和元器件的技术垄断,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第三,要借鉴延安时期的人才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延安时期,党凭借开阔的政治胸襟和唯才是举的政策,吸引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依赖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投资。高校应当紧扣科技发展新趋势,打破传统学科限制,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急需的交叉学科人才与拔尖创新人才。必须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和赋权改革,合理构建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让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在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同时,采取内核稳固、外圈开放的策略,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科学合理地共享大科学装置,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来华合作,将我国打造成国际科技治理的重要策源地。

五、结语

从陕甘宁边区的“自力更生”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的“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初心与决心从未改变。面对大国博弈的波谲云诡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浩荡浪潮,延安精神绝非是历史的陈迹,而是烛照现实、指引未来的精神旗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广大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必须深学细悟延安精神的理论精髓,紧扣创新使命,把精神伟力转化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让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确保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